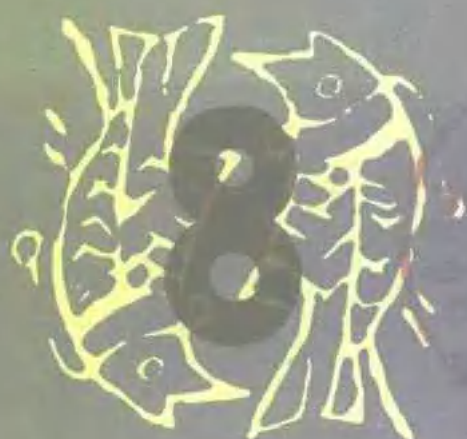


泉州文史



一九八三年
“泉州历史与文化”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刊





闽版刊字第〇三七号



泉州文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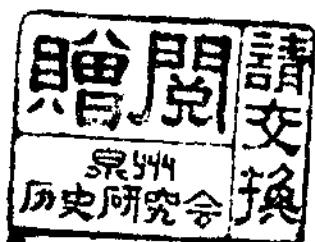
第八期

编辑者 《泉州文史》编辑部
(福建省泉州开元寺内)

出版者 泉州市历史研究会
政协泉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印刷者 晋江地区印刷厂

本期每册 1.00 元



泉州文史

第8期

目 录

海 交 史 讨 论

- 宋代泉州市舶司设立问题探索..... 傅宗文 (1)

闽 台 关 系 史

- 从族谱资料看闽台关系..... 庄为玑 王连茂 (11)
元朝澎湖巡检司隶属考..... 吴幼雄 (26)

乡 族 史

- 晚清泉州一个典型的世家——黄宗汉家族试探..... 陈盛明 (29)

宗 教 史

- 黄檗木庵禅师——赴日扶助隐元法化的泉州开元寺僧..... 沈玉水 (40)
泉州开元寺兴衰初谈..... 王寒枫 (51)
元代泉州方济各会遗物考..... 杨钦章 何高济 (62)

历 史 人 物

- 学事、候批、重游——从诗作看朱熹在泉州..... 何乃川 (74)
入台平倭患——沈有容在泉州的历史功绩之一..... 郑煥章 (81)
蒲氏兄弟之父——蒲开宗..... 陈自强 (86)

文 物 考 古

- 南安九日山摩崖石刻校记..... 李玉昆 (88)

方 志 考 述

略谈《温陵开元寺志》及其作者释元贤…………… 李秉乾(96)

近 代 史

鸦片战争前夕泉州的鸦片走私和1840年的抗英斗争…………… 陈泗东 张家瑜(105)

方 言 研 究

晋唐古语在泉州…………… 黄典诚(110)

译 文

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 [荷]伦纳德·鲍乐史 著(121)
温广益 译

宋元时代泉州的发达与广东的衰微(续)…………… [日]成田节男 著(135)
庄景辉 译

文 史 简 讯

“泉州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综述……………(150)

“泉州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目录……………(153)

泉州历史研究会举行第三次会员大会……………(157)

会 员 著 译 介 绍

《郑和》中译本即将出版……………(158)

~~~~~

图 版 泉州古基督教石刻……………封二、封三

木庵禅师遗墨……………插页

# 宋代泉州市舶司设立问题探索

傅宗文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设立广州市舶司。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至端拱二年(989)间,又设立杭州、明州市舶司。之后,才又迟迟于哲宗元祐二年(1087)设立泉州市舶司。

一个有着海外贸易悠久历史的泉州港,市舶司的设立却格外迟缓。本文试对此扑朔迷离的历史问题,略作一番探索。

泉州海外贸易的历史很长。晚唐时节,便日趋繁盛。所谓“船到城添外国人”<sup>①</sup>,勾勒出蕃客憧憧的热烈景象。从天祐年(905—907)中起,王延彬镇守泉州达二十七年之久,“仍岁丰稔,每发蛮船,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侍郎。”<sup>②</sup>海外贸易更有了相当的进展。之后,留从效统治期间(947—962),鼓励海外经商的政策得到延续。“陶瓷铜铁泛于蕃国,取金贝而还,民甚称便。”<sup>③</sup>后周显德年中,居然能一次向中原王朝贡奉白龙脑香一千斤<sup>④</sup>。这期间,泉州城也自丰州谷地迁来新址后,首次加以扩充。“云室万家,楼雉数里。”<sup>⑤</sup>並从此以刺桐城的美称播誉海外。留从效之后,陈洪进夺得泉州的统治权。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至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二年中,向宋廷贡奉五次。其中乳香等香料一项,即多达十五万七千斤,另有象牙七千斤,犀角二十五株,白龙脑二十斤,以及真珠、玳瑁、没药、阿魏、麒麟竭等贵重物品<sup>⑥</sup>。显然可见,在陈洪进归诚北宋朝廷的前夕,泉州作为海外贸易港口的基础已经奠定,贸易数额也达到一定的水平。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8),陈洪进和钱俶相继纳土,估计为时不长,宋廷即设立杭

①《全唐诗》卷五五九,薛能《送福建李大夫》。

②佚名《五国故事》上。

③《清源留刘族谱》卷一《宋太师鄂国公传》。

④同上书卷二《浩敕》。

⑤同上书〔宋〕张赞明《宋太师鄂国公墓碑铭》。

⑥《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六——九。

州、明州市舶司，唯独泉州付诸阙如。笔者以为，这应与当时泉州地方的政治状况有关。

陈洪进纳土后，漳泉地区随之爆发一起农民战争。暴动农民起自仙游、莆田以及百丈镇，进围泉州城。由于宋军的镇压，始告失败。<sup>①</sup>但在一段时间里，却使得当地社会秩序深受影响。这又不能不使宋廷对泉州市舶司的设立有所顾虑。

太宗太平兴国年中，由于岭南统一的结果，“海南诸国连岁入贡通关市。”<sup>②</sup>海外贸易一度旺盛。为此汴京特设立香药榷易院，对海外贸易加强管理，各类舶来品也“充盈（榷易院）府库”。但造就这个局面还另有原因。原来太平兴国元年（976），朝廷即订立极为严峻的禁榷刑律：民间商民敢与蕃客交易，计值一百文即科罪，过十五贯黥面配海岛，再过押赴谪治罪，妇人犯罪配充针工。与此同时，朝廷实行经济垄断包买制度，凡舶货“官尽增价买之”，交榷易院经售<sup>③</sup>。这种作法固然能收一时之利，从长远看，却不能不带来严重后果。海内外舶商与民人的强烈反抗，使得蕃舶贸易迅趋下降。所以雍熙四年（987）朝廷不得不派人分赴海外“勾招进奉，博买香药”<sup>④</sup>。广州、漳泉系禁榷重点地区，只维持一处市舶司，符合朝廷的经济决策。

此后，直至仁宗末年，海外贸易额停留在踏步不前的水平线上。太宗太平兴国年中，香药榷易院岁入最高额为五十万贯<sup>⑤</sup>。淳化二年（991）岁入约五十余万斤、条、株、颗。真宗天禧末（1021）五十二万三千余斤、条、株、颗。仁宗皇祐中（1049—1054）五十三万斤、条、株、颗。太平兴国年中岁入以货币贯缗计算，其后则改以舶来品单项计算，货币收入当低于太平兴国年中的岁入。仁宗天圣年中，市舶尤其冷落。天圣“六年（1028）七月十六日，诏广州近年蕃舶罕至，令本州与转运司招诱安存之。”<sup>⑥</sup>由于蕃舶稀少，押纲使臣无事可做，端作请给。此时为“三冗”所窘的朝廷，竟至把他们抽回三班院，何时船到发纲，经马递申奏，再行派遣<sup>⑦</sup>。广州为当年最大港口，犹且如此，杭州、明州市舶司的窘状更可以想象。在如此困顿情势下，增置市舶司，根本不可能。

## 二

宋太祖于建国之后，为确立和巩固重新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制度，曾经不得不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采取高度集中的措施，以防范地方割据的再现。蕃舶贸易自不能例外。市舶使及其下属由朝廷任命，市舶司在特定港口遵照朝廷指令，统一管理对外贸易

①《宋太宗实录》卷四四，雍熙五年三月戊午。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二二。

③《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④《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二二。淳化、皇祐岁入见《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天禧岁入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天禧五年岁终。

⑥《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四。

⑦《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之一〇。

事务。对于舶货，北宋初期实行包买制度。太宗淳化二年（991）四月，宋廷鉴于包买制度有弊病，“良苦相杂，官益少利”，作出新规定：榷货以外，其他货物，择良买半，余外听舶商自由售卖<sup>①</sup>。这种分成（官）榷买、（商）自卖制度，一直维持到神宗元丰年中，“元丰法：更不起发，就本处出卖。”<sup>②</sup>至此才发生根本变化。

北宋朝廷关于舶货的禁榷制度，使得贸易港口的自然条件选择，必须拥有一条畅通、方便、安全、省钱的交通运输线的意义，显得更加特别突出。

广州——开封之间的运输线有二条：一由广州西入桂州，顺湘江北上荆湖南北，经江陵荆门东向到汴京<sup>③</sup>。二由广州北越大庾岭，泛赣江经洪州入鄱阳湖下长江进运河到汴京。前者为迂道，所以早经废弃。大约宋初以后，香药纲运即取道大庾岭路北运。这条线路相当方便：自广州水行十六日抵南雄州，翻越大庾岭至南安军只有数十里，南安军放舟赣江四日到虔州，虔州以北，江宽水大，舟行迅便<sup>④</sup>。因此，真宗咸平五年（1002），朝廷为节省纲运费用与时间，决定先自南安军至虔州的陆运改为水运，一下省却香药递铺军士与使臣六千一百余人<sup>⑤</sup>。

杭州是纵贯长江南北大运河的南端，沟通开封，自然十分方便。

明州——杭州之间有着浙东运河互相联结。自杭州城南浙江省横渡浙江抵西兴镇，经肖山、山阴、会稽县各段运河，至上虞县经运河入余姚江，慈溪抵明州。这条线路，虽有所谓“三江重复，百怪垂涎，七堰相望，万牛回首”<sup>⑥</sup>的艰难之处，但明州香药纲运却可以避开杭州湾的浅沙陷溺的危险，循由此路直达杭州转入大运河送抵汴京。

广州、杭州与明州早在北宋开国初年即设立市舶司，其港口优良与交通运输方便，显然得到朝廷的优先考虑。

泉州的交通运输条件就逊色多了。

福建路是典型的丘陵地带，境内山岭耸峙，岗峦密布，河谷与盆地交错其间，海岸线曲折，地形的区域差异大。南剑州以西属古生代卡列东折皱带，以东属中生代浙闽太平洋折皱带，所以山脉均作东北西南走向并与海岸线平行。自西向东，地势分作三个台阶：第一级为杉岭山脉系统，包括闽浙交界的枫岭（仙霞岭）、闽赣边界的武夷山和杉岭，海拔高度一千米以上。第二级为戴云山脉，横亘于中部，海拔高度八百米左右。第三级为沿海低丘与平原。泉州在福建路东南，所属县份自戴云山中心区向沿海展开。所以，泉州港香药纲运如走陆路，就必须由东南低地翻越横贯的无数峻岭，而后进抵杉岭山脉。出杉岭山脉有三大隘口，即东北的仙霞岭，崇安县迤北的分水关以及光泽县以西的杉岭。宋代福建纲运走的是分水关即所谓武夷道一线。从泉州发纲，经过南安、永春、德化县，翻越戴云山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②同上四四之一一。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八之一三。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元丰四年三月戊子注。

⑤《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一八。

⑥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水》注引蔡肇《明州谢上表》。

中心区,又经尤溪、沙县抵南剑州,再北越建州武夷山脉,出分水关入江南东路信州境内。从这里当时也有二条北上汴京的路线:西线从信州西入江南西路的洪州,泛鄱阳湖绝江至淮南西路的舒州再北运到汴<sup>①</sup>。东线则自信州经衢、婺、越州抵杭州,由大运河舟运到汴京。如航海北上,五代时即“漂没者十四五”<sup>②</sup>,多“损败”<sup>③</sup>。所以,北宋前期,福建纲运普遍由陆路运输。一路上要攀高山、渡湍流、走鸟道,山深林密,困苦万状。建剑山区又经常爆发规模不等的私盐贩或农民暴动,因此纲运的安全也没有多少保证。为了适应高山地区运输的格外困难,一路上递铺林立,单崇安县至信州铅山县,毗邻两县间即置摆铺兵级一营,共一千人<sup>④</sup>,因而朝廷的财政负担也大。此外,高山地区瘴气弥漫,气候恶劣,铺兵发病及死亡率又很高。自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后,朝廷不得不特别加以优待。是年“九月,诏福建山路险恶,其辇致官物军士,自今遇旬休节序,並特给假。”<sup>⑤</sup>所有这些必然成为泉州设置市舶司问题的障碍。

### 三

把泉州设立市舶司问题首次提到朝廷议事日程上的是神宗熙宁五年(1072)诏书。《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之”。

按薛向至迟在熙宁五年(1072)四月已权三司使<sup>⑥</sup>,则神宗诏书至迟应在这年春天发出。据诏书,有臣僚建请于泉州置市舶司。笔者认为建请者可能即熙宁初任福建转运使的罗拯。神宗即位之初,为广开财源,兼制四夷,曾于熙宁元年(1068)密令罗拯派遣泉州商人黄慎远航高丽,向高丽寄意<sup>⑦</sup>。翌年牒复。三年(1070),罗拯以高丽“即备礼朝贡”的诚意申奏,朝廷以“结之以谋契丹”着眼,又“命拯谕以供拟腆厚之意”<sup>⑧</sup>,罗拯遂再派黄慎前往高丽<sup>⑨</sup>。这期间,罗拯对泉州港的政治、经济以及自然环境有深切了解,同时又颇为神宗所倚赖,由其建设设立泉州市舶司,也符合转运使司的财政需要。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八之一三。

②《旧五代史》卷一三四《王审知传》。

③同上书卷二十《司马邺传》。

④《宋会要辑稿·方域》一〇之五〇。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二之四。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二,熙宁五年四月。

⑦〔朝〕郑麟趾《高丽史》卷八,宋纪年熙宁元年七月“宋人黄慎来见,……慎等来传天子之意。”

《宋史》卷三三一《罗拯传》:“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熙宁二年,高丽移牒罗拯:“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亦作黄慎。(《高丽史》资料转引自〔日〕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第431页)

⑧《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

⑨《高丽史》卷八。

在罗拯任福建转运使的前夕，泉州的海外贸易有所发展。仁宗嘉祐末年，“舶商岁再至，一舶连二十艘，异货禁物如山。吏私与市者，价十一二售，幸不诤何！遍一州吏争与市。”<sup>①</sup>罗拯有鉴及此，自必向朝廷建言设司，完全符合情理。

但是，这事无下文！？

这是一个谜。谜底，文献无征。

然而联系全局，仍能获得切实的答案。大概与神宗下创法讲求置司泉州诏书相先后，熙宁五年（1072）三月二十六日，王安石变法派决定设立市易务（次年改称都提举市易司，总辖国内诸州市易务），並随之任命三司判官吕嘉问为市易司提举。吕嘉问出身京东豪门。当时，“韩、吕，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sup>②</sup>仁宗末年，王安石与韩、吕两家子弟深相结纳。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以参知政事身分发动变法，与吕公著等人政见不合，友谊破裂。而吕嘉问则投入变法派阵营，因此深受王安石的宠信。王安石即曾在神宗面前称道三司判官“吕嘉问最为称职”<sup>③</sup>。吕嘉问任市易务提举后，违反章程，极力扩充事权。元丰三年（1080）都提举市易司承认：“市易之法有三：结保、赊请一也，契书、金银抵当二也，宽迁物货三也。”<sup>④</sup>宽迁物货即违反章程。其实还有第四：控制市舶，笼利蓄货。熙宁七年（1074）三月，神宗下诏“根究市易务不便事”之后，其内幕才逐步揭露。

例证如下：

（一）高丽入贡，神宗曾“诏以付市易务售繖帛答之”<sup>⑤</sup>，可见朝贡答礼物品，其时由市易务掌理。

（二）熙宁七年（1074）四月五日，诏自今诸国进奉人到阙，更不差市易务上界官主买卖。”<sup>⑥</sup>可见朝贡物品的买卖，曾由市易务经管。

（三）同年同月十七日（按：这天王安石罢相），神宗“仍下杭州、广州市易务勘会违法事。”十九日“又批：闻广州市舶司顿亏岁课二十万缗，或缘市易司之故，致舶客不至。未知虚实，可体量推究以闻，”后查明：“广州市易务勾当公事吕逸擅入市舶司拘拦蕃商物”，显系违法。市易司又试图吞併广州市舶司，神宗察知，于同年六月十九日“诏广州市舶司可依旧存留，更不併归市易务。”<sup>⑦</sup>

（四）同年八月，前权京东转运判官王子渊坐责，因其曾“擅于密州置市易务，借官钱市（舶客）乳香。”<sup>⑧</sup>

① 晁补之《鸡肋集》卷六二《杜纯行状》。其任职泉州时间据《宋会要·职官》六五之二六。

② 邵伯温《闻见前录》卷三。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〇，熙宁五年二月乙卯。

④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二九。

⑤ 《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

⑥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三六。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熙宁七年四月丙戌、己丑。同书卷二五四，同上年六月甲寅、乙卯（按：《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六作七月）。

⑧ 同上书，卷二五五，熙宁七年八月癸酉。

(五)元丰六年(1083)知密州范锴奏请设板桥镇市舶司,朝廷令吴居厚斟酌方案。吴居厚初拟设榷易务。按榷易务于熙宁五年(1072)七月归併为市易司西务下界。吴居厚所拟方案,适足证明市易司总括海外贸易的企图长期未变。

由此可知,市易司敢于笼括海外贸易利益,直至试图吞併当时最大港口广州的市舶司,也就自然断不允许添设他处市舶司。因此,泉州设置市舶司的拟议,势必遭到强烈反对而束之高阁。

此外,据宋人记载:吕嘉问“挟王安石势,陵慢三司使薛向,且数言向沮害市易事,安石信之。”<sup>①</sup>在吕嘉问的挟持下,薛向事事屈从。市易司残虐商人,管责、黥面、编管<sup>②</sup>,无所不为,而薛向听之任之。为此,熙宁七年(1074)根究市易司时,薛向也受到牵连责备。似此,薛向虽受诏创法讲求泉州置司事宜,一旦遭到市易司反对,岂敢与争,也只有再次屈从了。

#### 四

区域差别是封建生产方式固有的特征。浙西、浙东、福建、广东各经济区局部之间,不但在封建基础经济部门——农业、手工制造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同时也在国内外商业贸易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同。其结果必然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以及由此树立的行政部门之间产生矛盾摩擦,互相妒忌、齟齬、争斗。这个情况由来已久,而到了神宗时期,大开理财之门,实施财政比较以后,官员便纷纷以邀幸赏为荣耀,区域性的矛盾于是更加突出。

熙宁九年(1076)五月二日,给事中集贤殿修撰程师孟乞罢杭、明州市舶司,只存广州一处。熙宁年中通过泉州商人的联系,宋廷虽然与高丽朝廷之间的交往再度实现,但对民间海商,仍“禁私贩高丽”<sup>③</sup>。其结果,以东北亚国家或地区为主要贸易对象的两浙市舶司,其海外贸易势必颇受影响。程师孟可能针对这个问题,提出奏请。神宗熟知三处市舶司的利害冲突,因之“诏:悉逐州有未尽未便事件,令更取索重详定施行”<sup>④</sup>。经过争吵讨论,三处市舶司依然分立。但划分贸易区域,东南亚、西亚、东非各国或地区划归广州市舶司管理,並附带条件:“往复必使东诣广,不者没其货。”<sup>⑤</sup>尔后,元丰三年(1080)八月二十三日,中书门下作出正式规定:“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蕃纲舶缸,非明州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一,熙宁七年三月壬戌。

② 晁补之《鸡肋集》卷六二《杜纯行状》。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六,元丰二年正月丙子。

④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六。

⑤ 陈璘《丁斋集·先君(陈偁)行述》(《永乐大典》卷三一四一《陈偁》引)。按:文中“东诣广”头二字倒文。《文献通考》卷六二《职官志·市舶》引作“诣广东”。何乔远《闽书》卷一百二《英旧志·绍绅沙县》作“诣东广”。均与陈璘《宋陈忠肃言行录》卷三《陈偁行实》类同。

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不以赦降去官原减。（其发高丽仍依别条。）”<sup>①</sup>显然，这一劄子文字，系市舶司条例，而熙宁末年的规定，系舶商条例。二十七日，朝廷命令两浙、福建、两广各路漕司负责实施。福建路以转运判官王子京“兼觉察拘拦”<sup>②</sup>。

北宋后期，泉州的海外贸易事业却仍在上升。郑侠，福建福州人，反对王安石变法，长期贬谪南方，二度莅泉任职，对泉州风情，非常熟悉。在其笔下，泉州状况是：“土疆差广，齿籍至繁。民业不丰，里俗喜讼。麇肆杂四方之俗，航海皆异国之商。”又如：“驿道四通，海商辐辏。夷夏杂处，权豪比居。”<sup>③</sup>江公望的《多暇亭记》描述蕃舶来往说：“海船通他国，风顺便，食息行数百里，珍珠玳瑁，犀象齿角，丹砂水银，沉檀等香，希奇难得之宝，其至如委。巨商大贾，摩肩接足，相办于道。”<sup>④</sup>所以，从熙宁到元丰年中三方瓜分贸易海域而继续将泉州舶商排斥在外，无视他们的根本利益，必然引起强烈的不满。而实施所谓“广州市舶条法”，福建转运判官王子京的“觉察拘拦”，不但将激起泉州舶商的反抗，而且也将尖锐化福建转运司与泉州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种种矛盾又会集中到一点，即泉州市舶司的是否设立。

据陈瓛的《先君（陈偶）行述》，王子京长驻泉州，凡未到广州抽解的住舶，“拘其货，止其舟”，“籍没以钜万计”，“踪迹连蔓，起数狱”。闹得人心惶惶。当时知州陈偶，为此与王子京发生冲突。王子京有恃无恐，“移牒譴公沮国法”。陈偶在申辩疏文中向朝廷呼请：

“自泉之海外，率岁一往，复令遵诣广（州），必两驻冬，阅三年而后返。又道有礁石浅沙之险，费重利薄，舟之南日少，而广（州）之课岁亏。重以拘拦之弊，民益不堪。置市舶于泉（州），可以息弊止烦。未报。”<sup>⑤</sup>

按：陈偶于元丰元年（1078）莅职，三年（1080）“得旨再任”。疏请于泉州置市舶司，在五、六年（1082、1083）左右，当时朝廷都提举市易司贾青，前任福建转运使，系王子京直接上司，二人关系密切，其在朝中庇护王子京，可以无疑。此外，自元丰三年（1080）中书门下订定“广州市舶条法”后，朝廷着力施行，企图扭转市舶岁课亏损局面。所以，范锴奏请于密州板桥镇设立市舶司，吴居厚最后以“如此则牵制明、广二州已成之法，非浙、广、江、淮数路公私之便”等原由敷衍了事<sup>⑥</sup>。既然如此，陈偶的吁请就只能是石沉海底了。

泉州港又一次遭受遗弃。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古代的商业民族存在的状况，就象

① 《苏东坡奏议集》卷八《乞禁商旅过外国状》。高丽别条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六，元丰二年正月丙子。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六。

③ 《西塘集》卷七《代太守谢泉州到任》，卷八《代谢仆射相公》。

④ 何乔远《闽书》卷五五《文苑志·令·永春县》。

⑤ 《永乐大典》卷三一四一《陈偶》引。

⑥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七、八。

伊壁鸠鲁的神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不如说,象犹太人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sup>①</sup>泉州港象存在于宋代专制主义政治的缝隙中,存在于局部经济区广、杭、明州市舶司互相摩擦的花岗石空隙中一样。但它是岩隙嫩芽,春催红绽。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辞世,哲宗继位。“元祐更化”一下展开。元祐元年(1086)七月右司谏苏辙奏请从速解决长期骚扰不安,社会矛盾颇为突出的市易欠钱问题。同年九月明堂肆赦,批准蠲除二百贯以下入户欠钱。当时户部尚书李常,熙宁初一度参与王安石变法,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发放青苗钱后,以抨击青苗钱“流毒四海”被贬逐,长期在京东一带任职,对密州板桥镇的海外贸易情形自然熟悉。他的三十多年密友苏颂,籍贯福建路泉州府同安县,泉州的海外贸易盛况,酒酣茶余,耳濡久矣。况且在他掌管户部这个财政机关之后,披阅积牍与陈偶、范锴的奏疏目染无余。所以,明堂赦书一下,他就条陈己见:

“请累息过其数(按:过市易欠钱二百贯),亦宜勿收。而复舒、鄂诸州钱冶与泉、密(州)市舶之法。其后(按即元祐二、三年)朝廷多行之。”<sup>②</sup>

元祐二年(1087)十月六日,“诏泉州增置市舶司”。<sup>③</sup>至此,泉州设立市舶司的公案了结,泉州海外贸易的沧桑历史告一段落。

## 五

笔者没有忘记捎上一段尾声:泉州设立市舶司具有何种社会意义?

这需要回到我们探索的始点:福建路在两宋时期之所以商业发达,是与其生产水平、人口膨胀之间的不平衡有关。“闽地偏,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所在闽,有闽之技艺。”<sup>④</sup>“家有余财,则远资健往,贾售于他州。”<sup>⑤</sup>“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业。”<sup>⑥</sup>正由于农业不足提供衣食基本需要,促使手工制造业、商业以及海外贸易业特别发达。

泉州尤其如此。仁宗嘉祐中,泉州惠安县人谢履出知郡属南安、清溪县,其所作《泉南歌》云:“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sup>⑦</sup>显然,泉州地方人口不断增长,生活水平的维持就不得不谋求海外转运商业以解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369页。

② 苏颂《苏魏公集》卷五五《李常墓志铭》。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八。

④ 曾丰《缘督集》卷十七《送缪帐干解任诣铨改秩序》。

⑤ 祝穆《方輿胜览》卷十《邵武军》。

⑥ 苏轼《东坡全集》卷五十六《论高丽进奏状》。

⑦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〇《福建路·泉州·诗》。

试看泉州及其腹地人口的发展趋势<sup>①</sup>：

| 年 代                    | 腹地州军 | 户 数     | 总 户 数   | 年均增长数  | 年增长率 |
|------------------------|------|---------|---------|--------|------|
| 唐宪宗元和年中<br>(806—820)   | 泉州   | 35,571  | 36,914  |        |      |
|                        | 漳州   | 1,343   |         |        |      |
|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br>(978)     | 泉州   |         | 151,978 | 721.92 | 0.7% |
|                        | 漳州   |         |         |        |      |
| 太宗太平兴国末年<br>(约982—984) | 泉州   | 96,581  | 154,295 | 386.01 | 16%  |
|                        | 漳州   | 24,007  |         |        |      |
|                        | 兴化军  | 33,707  |         |        |      |
| 神宗元丰三年<br>(1080)       | 泉州   | 201,406 | 357,049 | 2112.2 | 1%   |
|                        | 漳州   | 100,406 |         |        |      |
|                        | 兴化军  | 55,237  |         |        |      |
| 徽宗崇宁元年<br>(1102)       | 泉州   | 201,406 | 365,032 | 362.83 | 4%   |
|                        | 漳州   | 100,469 |         |        |      |
|                        | 兴化军  | 63,157  |         |        |      |

神宗元丰三年(1080)与徽宗崇宁元年(1102)泉、漳二州户数竟基本相同,显系不确。《宋史·地理志》照抄《元丰九域志》。但即使这样,北宋后期,泉州港沿海扇形腹地三州军人口,仍以百分之四的速度增长。宣和初年,泉州城内约有五十万人<sup>②</sup>。如北宋每户平均约十口计算,为五万户,占泉州户数的四分之一。可见,泉州市舶司设立前后,当地人口膨胀得愈加严重。

马克思曾经指出:古代国家希腊和罗马,“为了保存自己的文明,它们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公民,否则,它们就得遭受那种把自由民变为奴隶的沉重体力劳动的折磨。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那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sup>③</sup>

马克思就社会生产与人口数量的关系,给了我们一个辩证分析的光辉范例。宋代泉州与古代希腊、罗马所不同的是:封建社会正处于鼎盛时期的泉州,其向外移民则是与大规模经营印度洋与西部太平洋诸国家或地区的海上转运商业同时进行。不如此当然不行。“福建八郡,自莆(田县)而南,主户寡而客户多;由莆而北,主户多而客户寡。”<sup>④</sup>“自莆而南”,指的就是泉、漳州。我们也可以说:人口不断增长,如不向外移民,势必将客户人口及其集团状况推向越来越众多而又越悲惨的境地。

徽宗政和二年(1112)六月二十二日,有人向朝廷报告:“访问入蕃海商,自元祐后来,押贩海船人,时有附带曾经赴试士人及过犯行替胥吏过海入蕃,或名为住冬,留在彼

① 栏内年代依次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乐史《太平环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

②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〇《福建路·泉州·风俗形胜》引陆藻《修城记》。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619页。

④ 李幼杰《莆阳比事》卷一。

国,数年不回。有二十年者,取(娶)妻养子,转于近北蕃国,无所不至。”“又有远僻白屋士人,多是占户为商,趋利过海,未有法禁。”<sup>①</sup>报告未确指何方海商,但细味其事始于哲宗元祐年后,恰与泉州设立市舶司时间吻合。该报告指明,包括泉州港在内的向外移民事业不断扩大,以致赴试士人与汀留胥吏也都卷入漩涡。他们出海后,以住冬(又名住蕃)为名留在海外,与当地妇女组成华外结构的典型混血家庭。这类北宋首批华人,其足迹自印度洋迤邐至于西北太平洋各国。尤其是其中的士人与胥吏,具有较高文化。他们与其他华人以及当地民族一起,共同开发当时还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驻在国田园,发展当地文化,繁荣当地经济,作出贡献。他们在高丽、交趾等国则被当地朝廷委以官职,参与行政管理活动<sup>②</sup>。

泉州港出海的移民,第二种形式是把人口撒向地广人稀的二广地区。其中以广南西路沿海州军与海南琼管各地为重点。泉州海舶运去内地的农业与手工制造业产品,以交换当地黎、苗、徭等民族的珍珠、吉贝、沈水蓬菜等有名香料。“闽商值风水荡去其货,多入黎地耕种不归。”<sup>③</sup>他们加入少数民族开发海南州军的行列,并且逐渐地互相融合。

总之,泉州市舶司的设立,促进泉州港海外贸易事业的发展,并为泉州港日后成为世界东方第一大港奠定历史基石。同时,它又推动移民事业向更高的阶段前进。这一点,既真有不容忽视的国内意义,也具有不容抹杀的国际意义。

作者傅宗文,泉州历史研究会会员,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师。

①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五七。

② 《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三,熙宁九年三月壬申:“诏:福建、广南人因商贾至交趾,或闻有留于彼用事者。”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七,绍兴三十年十二月戊申。

# 从族谱资料看闽台关系

庄为玑 王连茂

## 前 言

谱牒作为几千年宗法社会的特有产物，它旨在通过载祖德，立族规，明宗支，分族从，一方面藉以增强“木本水源”、“敬宗睦族”的思想感情，一方面则在于宣扬封建伦理精神，让族权统治的绳索系结得更加牢固。虽然，这种记述以男性血缘为脉络的宗族世系之书，带有较大的封建性的消极因素，但是，由于谱牒所载的家族史，包含了诸如姓氏来源、家族兴替、人口升降、民族迁徙、风俗习惯、社会变故，以及族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活动等，其内容之丰富，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卷帙之浩瀚，实非他种文献典籍所能比拟。因此，历代史家编纂史籍，乞灵于官私谱牒者，实繁有徒。今天，在史学研究中，抢救与发掘谱牒资料，並持科学的态度加以分析、运用，乃是一项重要而前景光明的工作。

近几年来，我们曾致力于福建族谱的调查，迄今经眼者计一百五十余部，其中七十余部载有涉及闽台关系的资料，而以移民资料为最多，约十七万字。尽管这只是福建族谱中的一小部分，且族谱本身往往带有较大的局限性，但它所反映的各种真确而又具体的史实，不仅大大地有助于我们对于闽台关系，尤其是福建移民台湾问题的研究，而且为海峡两岸人民的寻根认祖，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资料。爰据所得资料，分述如下：

### （一）早期移民及其开基台湾的时间

福建人民移居台湾的时间，究竟始于何年，文献上确难找到具体依据。然可相信，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闽人之往台，当较他省为早。虽史称唐代浙江人施肩吾于元和元年（806）率族人到澎湖定居，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移民，但史学界持怀疑态度者颇有人在。目前见诸谱牒的最早移民，乃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德化县苏姓。据《德化使星坊南市苏氏族谱》七世祖苏钦于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撰的序文云：

“（苏氏一族）分于仙游南门、兴化涵头、泉州、晋江、同安、南安塔口、永春、尤溪、台湾，散居各处。”

苏钦字伯承,北宋宣和甲辰进士,官至利州路转运判官。该序既作于南宋初,则族人之分居台湾的时间,当可上推到北宋末甚至更早。时泉州已正式设立市舶司(北宋元祐二年,1087),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法定港口,商人足迹,远至亚非各国,其与台澎岛屿之联系,亦较前代密切,因而德化苏姓之迁台,是完全可信的。至于台湾名称的出现(宋时仍称“琉求”),很可能出自后人修谱时擅改。

迨至元代,由于元政府在澎湖设立巡检司,隶属于泉州路晋江县,闽台关系更进一步密切,移民人数也有所增加,我们在《永春岵山陈氏族谱》、《南安丰州陈氏族谱》中,均发现有元代族人迁台的记载。然而,直至明末第一次移民高潮到来之前,这种迁徙始终是一种毫无组织的个别的行动。特别是,明初实行海禁和一度强迫澎湖居民尽迁内地等错误政策,曾极大地妨碍了大陆人民大批前往台湾进行开发。从明洪武至万历的二百余年,七十余部族谱仅能找到嘉靖年间迁台者三人,便多少反映了这一种历史状况。这些先驱者的名字是:晋江安海人颜龙源,字日盘,生嘉靖甲午年(1534),葬于台湾,在大陆有妻室郑氏和一个儿子(《安平颜氏族谱》)。惠安东园人庄诗,生嘉靖壬寅年(1542),因“少遭兵变,与兄赴台湾谋生”。其身份估计是商人(《惠安东园庄氏族谱》)。

以安平颜姓为例,自明嘉靖间颜龙源往台后,至崇祯间始有颜开誉携眷迁台,并生了两个儿子,从而成为台湾安平颜氏的开基祖。据谱载:开誉字启符,号著寰,廷祺长子,是颜氏十二世,生万历辛亥年(1611),往台时间无载。按生年加二十年的一般计算方法,则开誉之迁徙台湾,约在崇祯初年,距前者已有八十年左右。后开誉又返回祖籍,并于康熙壬寅年(1662)卒葬晋江紫帽山,但妻室蔡节勤同两个儿子耀、焮依旧留在台湾。颜氏于康熙壬申年(1692)卒葬台湾大南门外水蛙潭瓦窑下,寿至七十八,估计是住在台南一带。后颜耀、颜焮在台湾传了不少子孙。

族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在考究有些族姓在台湾的开基年代,别忘了他们先辈的足迹来到此地的时间,不知还要早多少年!早期的开拓者,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往往不带眷属,而单人匹马,于荆棘丛莽中苦斗一生。这种情况,直至清初康、雍时代,犹甚普遍。从族谱看,移民携眷同往或在台婚娶者,在康、雍之前,占的比例很小,因而又形成这么一种情况:被认定为某姓之开基祖者,跟他同时甚至更早往台者,还有很多。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再略举数例于下:

晋江石壁乡玉山林氏,十一世四人于康熙初最早往台,家眷均留在大陆。至十三世族人迁台,始有携眷同往或在当地建立家庭者,但已是康熙末或雍正、乾隆年间的事了。(《玉山林氏宗谱》)

晋江新市乡曾姓,于明末清初迁台者六人,只有二人携眷。(《武城曾氏重修族谱》)

晋江衙口乡粘厝埔粘氏,于乾、嘉之际往台的粘粦、粘恩兄弟,被认为是台湾粘姓的开基祖。但仅秉珂公一派,乾隆年间往台者,还有二十二世的粘世约、粘世举兄弟、粘德路、粘德江等人,甚至十五世的三昂、二十世的廷璋,早已分居台湾。(《浚海粘氏秉珂公派私谱》)。

安溪参内黄姓,系唐初献桑园地建泉州开元寺的黄守恭之后代,三十五世黄宝于道光间到台北淡水山区定居,被认为是该地黄姓之开基祖。但族谱记载,从康熙至嘉庆的一百五十八年间,该族至少已有三、四百人迁居台湾的上、下淡水等地。(《安溪参内二房黄氏族谱》)

## (二) 移民人数、成份及迁徙原因

大陆向台湾的移民,历来以闽人居多,闽人之中,又以泉、漳二府各县为最。据1926年的调查,全台湾汉族居民共三百七十五万一千人,祖籍福建者达三百一十余万,占83%强。其中,泉州府各县占44.8%,漳州府各县占35.1%。据吴壮达《台湾的开发》一书的分析,形成这种地域来源特殊集中的主要原因,乃在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历史关系的密切,尤其是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对台湾的开发,以及后来历历时逾二百年的闽台合治制度。

我们仅从七十余部族谱中发现的迁台者姓名,已近四千人之多。其中,晋江《玉山林氏宗谱》和《安溪参内二房黄氏族谱》,均达一千人左右,说明移民人数确实很多。而这尚未包括那些笼统记载“族人分居台湾”、“此派子孙均移往台湾”,以及近代的一些统计数字。

近四千名移民可分为几个时期,其大约数字如下表:①

|         |      |
|---------|------|
| 郑芝龙时期   | 15   |
| 郑氏政权时期  | 49   |
| 康、雍时期   | 180  |
| 乾、嘉时期   | 1400 |
| 道光以后    | 1300 |
| 无生年未统计者 | 900  |

表格中数字,也包括那些在台出生的移民后代在内。从族谱记载可以知道,乾、嘉之前,移民的大多数系新自大陆迁徙而来;道光之后,新移民已渐少,而原移民生传子女,则迅速增加,成为多数。虽然,这个数字距历代移民的总数相去甚远,但它所表现的从郑芝龙时期到清乾、嘉时期移民人数逐步发展的趋势,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在台湾移民史上,明末郑芝龙据台时期、清初郑成功复台以后的郑氏政权时期、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的康、雍、乾、嘉时期,是三个最重要的时期。史学界把这三个时期出现

① 以生年加二十年为迁台时间。